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中西之间：批评的历程

——
胡亚敏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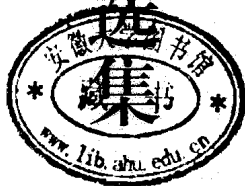
胡亚敏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中西之间：批评的历程

胡亚敏自选集

胡亚敏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之间:批评的历程——胡亚敏自选集/胡亚敏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5466-9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5598 号

中西之间:批评的历程

——胡亚敏自选集

◎ 胡亚敏 著

责任编辑:向 力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新视点

封面制作:胡 灿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343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5

版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一 学术访谈

- 借鉴·整合·创造: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道路
——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3)
- 拓展文学批评的视界
——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10)

二 叙事理论

- 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 (19)
- 重构原始思维之图
——读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27)
- 小说是什么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 (33)
- 论自由间接引语 (36)
- 文学批评中的疑问文本 (41)
- 叙事学与白话短篇小说
——读《中国白话小说史》 (46)
- 金圣叹的阅读文法 (50)
- 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 (57)
- 论意识形态叙事理论 (70)

三 文学批评

- 浅论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 (77)
- 论毛泽东的文学批评 (84)
- 开放的民族主义
——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之立场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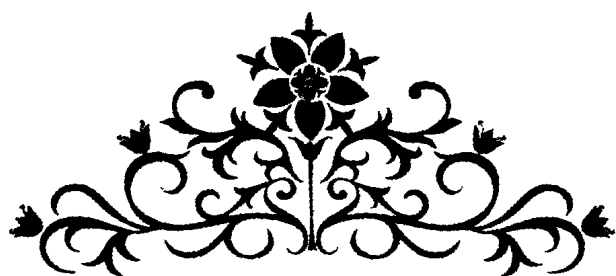
论当今文学批评的功能	(100)
阅读的艺术	(108)
文艺美学的新发展	
——读杜书瀛先生《文学原理——创作论》	(115)
审美·资本·日常生活	
——评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	(120)
反思与建设同在 危机与机遇并存	
——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述评	(128)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	(137)

四 比较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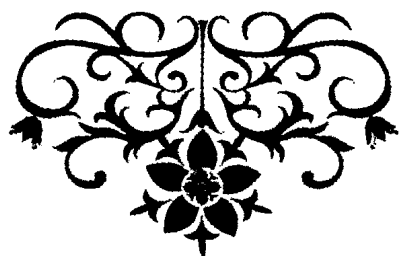
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	(151)
钱钟书与比较诗学	(157)
中西文论术语检讨	(163)
不同语境下的后现代	
——与詹姆逊的对话	(166)
论文学与科技的联系和渗透	(175)
中西之间	
——中国文学批评三十年	(183)

五 教学研究

英美高校比较文学课程研究	(229)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37)
国家精品课程“文学批评”网络建设探索	(248)
后现代教学理念与研究型教材编写	(251)
以生为本,探索体验式教学的本科人才培养改革	(258)
附录 1 《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译者前言	(263)
附录 2 《批评的实践》译者前言	(266)
附录 3 《文化转向》译者前言	(268)
后 记	(273)



一 学术访谈



借鉴·整合·创造：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道路

——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李定清*：胡亚敏教授，据我所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您就在文学批评这个领域里耕耘，而且您的研究方向都是很具前瞻性的，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您的文学批评研究，主要涉及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理论批评比较这三个领域，而这三个领域的研究又内在统一于一个立足点，即探索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的有效途径，为中国文学批评建设提供建设性资源。您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探索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的道路的？

胡亚敏：就我的学术经历来说，走上探索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之路，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我原本是师从王先霭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84年，我有幸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尹慧珉老师，当时她推荐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汉学家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主编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一书，并通过她征得作者同意，由我和我的同学张方将该书译成中文。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晚清小说的研究有不少新见，而这与其所采用的结构主义方法有直接关系；同时，汉学家的一些牵强和片面之处特别是中国小说理论的缺席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于是，在确立硕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腰斩”《水浒》的金圣叹为研究对象，并将代表西方叙事理论最新成果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作为参照系。不过，当我真正涉足结构主义叙事学这个领域时，才发现要真正了解结构主义叙事学殊非易事；当然，在怀疑、挑剔、抗争中，也被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深邃和别致所折服，后来索性开始了对叙事学的全面研究。经过七八年的时间，四易其稿，写成了《叙事学》^[2]一书。我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诚如“后记”里所说的，是为整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参照，也是想为我的同行和我尊敬的作家们做点什么。《叙事学》可以说是我将西方文学批评运用于中国文论研究的初次尝试。

转向探索西方文学批评中国化道路的另一契机，是我对比较文学的学习。

* 李定清（1963—），湖北文理学院（原襄樊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专业博士。

中西之间：批评的历程

1985年，我参加了由乐黛云先生在深圳大学主持的“比较文学讲习班”；1986年，我被学校派往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主要研究比较文学。虽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我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产生怀疑，但比较文学面向世界的胸怀和思维方式上的联系与比较的意识，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原本想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我，开始把关注的焦点移向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此后的20多年，我经历了对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消化和建构^[3]。90年代末，我逐步转向与中国社会有一定亲和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选取了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作为研究个案，试图通过对他的研究，为中国文学批评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2002年，我以“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批评——詹姆逊批判”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现已基本完成。如今，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中建设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已成了我们的学术自觉。2005年12月，我与我们学科组的成员们一起，申报了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虽然功亏一篑，但我们仍会在这个方向上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中国学人在探索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道路上必须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定清：我们知道，您的《叙事学》1994年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有些作家从该书中获益不少，人们在评论当代文学作品时，也经常采用《叙事学》中的一些观点。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三年，《叙事学》被人们引用达127次之多。与西方经典叙事理论比较，您的《叙事学》有哪些特色？

胡亚敏：我撰写的《叙事学》是在有选择地分析、吸收西方叙事学成果及现代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叙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对叙事理论所作的系统建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特色：其一是突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封闭性，提出了一种以文本形式和阅读过程为重心的叙事理论。我注重将叙事文的形式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把叙述方式和技巧置于突出位置，深入揭示叙述方式在叙事文中的“组合潜力”。在肯定“写什么”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的同时，认为形式比主题更为丰富，“怎样写”同样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同时，我又从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叙事文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具体阐述了三种新的阅读模式：叙述阅读、符号阅读和结构阅读。其二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创作和理论原则。根据叙事逻辑的可能性原则，我充分肯定非线型情节在叙事文学发展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同时对“情节的统一性”提出质疑；在人物理论研究中，提出“人物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人物将在矛盾中不断地被否定和置换，为小说创作中向对立面转化的人物塑造提供了理论支持；在阅读研究中，强调了文本性质的未完成性和可交流性，其中对“疑问文本”形式特征的阐述展示了文本和读者的一种新型关系，为形式批评与意义阐释的结合

进行了一些探索。

李定清：前一段时期，我国文学批评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一是重翻译、评介，少辨析、对话，产生了以西方文论的概念和术语为时尚的学术风气；二是提出“失语症”，试图通过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融汇西方文论话语的途径，来完成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建设。这两种倾向其实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途径。反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又确实需要他种理论养分来滋润和激发。您认为我们对“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应该持什么立场？正确的解决途径应当是什么？

胡亚敏：应该说，你所说的这两种倾向对于推动我国文学批评建设还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我国文学批评在处理与西方文论的关系上也有过一些教训。我认为，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到我国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文化语境，离开了现实基础，我们的探索就失去了针对性。

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孕育和发展历程，与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世界“全球化”的趋势有关，也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是在强大的压力乃至严重的威胁下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转轨的，缺乏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在学科理论方面无系统的学术清理和建设，因此现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正是这种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使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只能穿行于背负传统和面向世界之间。也就是说，不吸收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以改变传统文论的陈旧格局，我们的文学理论就无法适应新文学的发展和跟上世界潮流。可是，对西方文论若不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借来的思想则无从生根，理论批评无法阐释本土的文学实践，中国文论也不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和获得与世界交流的话语权。

有鉴于此，我认为，在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须立足当今，中西兼容。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的过程，需要深入考察当今中国的生存环境和文学史、文学创作实践，它只能在研究中国问题和文学事实中生成。其次，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也应考虑全球化语境中的共通性和亲和性，西方文学批评的语汇、理论、方法和观念，可以部分地被中国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演化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有机成分。即使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本身的研究，也应该着眼于中国的实际，以达到相互揭示、交流对话的目的。

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来从事这种研究，我的思路：一是以点带面，重点突破，选择并集中研究若干批评理论问题，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成果的创造性；二是重在发掘研究对象的建设性资源，即不仅要注意对研究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更要注意各种理论中隐含的合理成分，探索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的有效方式。

李定清：20世纪90年代以后，您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詹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后现代理论研究上。但如有些詹姆逊研究者所感到的，詹姆逊的理论批评丰富驳杂，艰涩难懂。作为以点带面、重点突破的个案，您为什么要选择詹姆逊呢？您认为詹姆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最突出的贡献是什么？

胡亚敏：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之所以选择詹姆逊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多次来华讲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定的影响；也不仅仅因为他对第三世界文化充满同情，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期待。詹姆逊作为西方当代文坛最富挑战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一，他所坚持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与我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有一定的亲和力；他视野开阔，涉猎极广，犹如一面多棱镜，能够折射出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的面貌。他对后现代文化的精辟、锐利的分析，乃至他在理论上的种种矛盾和瑕瑜互见的政治批评实践，都可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有着诸多的贡献。“社会形式诗学”是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与形式主义批评加以综合，通过语言、文本与历史、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建构而建构的。卢卡契曾说过，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詹姆逊对此非常认同，一直很重视形式研究，尤其关注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及形式在现代主义中的作用等问题。但他所主张的语言和结构，又不完全是自主的。他借鉴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理论，来揭示从现代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等一系列批评话语中，语言、结构、无意识等概念或理论所蕴含的历史、意识形态因素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他指出，范式的变化就是一种历史性，形式主义所追求的艺术变化和艺术革新本身就具有历史感，进而他认为任何批评流派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就是要从文本中读出对社会幻想和意识形态的遏制。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姆逊对这一批评方法又作了进一步界说。在“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下，他将自己的文化批评实践归纳为三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阐释层次：第一层次是政治的，即直接的历史事件，他将具体的文学作品或文化文本作为象征行为加以精细地分析和注释；第二层次是社会的，即阶级和阶级意识，他将被分析的文本在相互对抗的群体和阶级的对话中重构，并进行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第三层次是经济的或更广阔的历史的，也就是生产方式，他将文本放在整个生产方式的复杂系统中阅读，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对抗性地共存于一个文本中，而文本则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他身体力行，将三个层次阐释策略运用到自己的批评实践中。

李定清：我认为在后现代的问题上，詹姆逊有很多深刻的论述，的确是充满了睿智和洞见。请您就西方后现代与当今中国的关系谈谈您的看法。

胡亚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国化不可避免的问题，很复杂。一方面，西方的后现代与中国当今状况存在着一定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的外部条件就在于全球化时代经济文化的共生性。世界各国的经济模式正在互相吸收，差别逐渐缩小。市场经济不再是哪一个制度所独有的特权，而是一种普遍的经济模式。在文化交流上，虽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但随着艺术的广泛传播，人们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在艺术欣赏上会有更多的共鸣。特别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的各国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也趋于接近，一种新的文化思潮一出现，很容易在各国引起反响。正是人类共同点的增多，使后现代在中国的蔓延成为可能。亲和性的内在原因则存在于我国新时期的现实土壤之中。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社会变革，与西方60年代的社会变革有相似之处。如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60年代的西方经历了一个从热情高涨、普遍解放到怀疑理性进而彻底地反理性的过程，在我国的新时期也经历了一个反思过去、怀疑理想、消褪神圣、走向生活的时代，这一现实土壤使后现代在中国文坛的理论和创作上获得了广泛的回应。在文艺创作上，不少艺术家在小说、诗歌、绘画中表现了他们所理解的后现代，有些作家强烈地吐露出对传统文化、对现存观念的反抗情绪，消弭崇高，追求快感，从政治性转向现世性。作家王朔总是用一种游戏的口吻，对日常生活恣意调侃，以适应读者日益增长的对娱乐性的要求，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中国的后现代与西方仍存在着相当大的文化差异。后现代在中国毕竟缺乏本土现实的原发性，就像“后现代”作为名词在翻译时可以对应，但在不同语境下其内涵却存在很大的歧义一样。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和语境，并且是与中国的民族性格、传统和现状紧密相连的，而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传统的反思。在哲学上，中国没有西方后现代所反抗的哲学背景；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同的历史进程。后现代在西方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与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相伴随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沿袭性，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今的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手工和机械并作的农耕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状况，农业人口的素质现状，极大地累及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国情离产生“后现代”的那个消费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文学艺术上看，也有差异。中国的“后现代”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时间概念，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家虽然也吸收了西方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借鉴英法和俄苏的现实主义作品，创作的主导倾向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并未形成气候。中国的“后现代”主要不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而是针对现实主义的，或者是对西方后现代的摹拟以及对现实的宣泄。可以说，

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只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姿态或者说形式框架，而并非具体内涵和体验。

李定清：西方文学批评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对话和批判，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设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文化互相观照、互相揭示、互相补充，从而各自突破自身的局限，实现超越和发展。您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长篇发言“理论仍在途中——‘詹姆逊批判’”，据说曾引起詹姆逊本人及与会中外学者们的强烈反响。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您与詹姆逊的对话，或者叫“詹姆逊批判”中，您认为他理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胡亚敏：关于詹姆逊理论上的局限，我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感觉到的。我认为他的理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詹姆逊所设计的“元评论”的包容性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詹姆逊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优先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照和解释其他文学批评，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他试图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其他批评的结合点，通过博采众长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当代转换，这种努力也实属不易。但如果把那些不同立场的批评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框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性质，即由一种激进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批评，变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批评，而这种包容性所产生的张力就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泛化，甚至暗中削弱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社会批判性质。二是“历史”概念的悖论。詹姆逊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学者，在《政治无意识》的开篇，他就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但他在强调“历史”的绝对性的同时，又将“历史”置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将历史视为绝对的视野，在研究中坚持永远历史化；另一方面，“历史”在研究中又是缺席的，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詹姆逊既承认历史的存在，将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又表示历史是无法直接把握的。他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以福柯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代表的历史观之间的关系，结果却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地。三是关于批评中的政治性理解问题。可以说，政治性理解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批评中。政治性理解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突出贡献，但也是最遭人诟病之处。尽管他在对文本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同时，也主张批评应该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文学批评要么成为历史阐释，要么得出的都是政治结论，很难全面充分地阐述纷繁复杂的文学作品。不过，我认为，詹姆逊批评理论中的利弊对于中国文学批评都是一种激励和启发，詹姆逊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断思考的可能。

李定清：在西方文学批评本土化方面，您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 21 世纪的今天，关于我国文学批评的建设，应该进入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建构时期了，您能否结合研究实际谈谈您的设想？

胡亚敏：我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谈到，西方的问题在影响中国，中国的问题也在影响世界。在迈入 21 世纪的今天，面对中国文化环境的变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正逐渐从消费理论的国家向生产理论的国家转化。目前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我自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探索中，通过走近、理解、对话、比较和批判，也有一些思考：一是在叙事理论方面，我提出了意识形态叙事理论的构想，这是我在有选择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后现代文化理论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历史阐释和政治批判，主张恢复叙事的历史维度，并且力求为形式和构成要素注入意识形态因素；这一模式还提倡叙事文内的异质并存，以及批评方法上的内在与外在结合，由此展示出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二是关于文学批评的，我正在思考建构一种富有张力的批评模式，即“文化—形式批评”，这是我对各种批评范式和话语的改造和综合的心得。我设想的“文化—形式批评”将突破“社会—历史批评”、“形式主义批评”乃至 20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意欲使文学批评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局限，以多视阈的研究角度和“解区域化”的研究对象来应对当今形形色色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是文化审视与形式美感的结合。它一方面在更为宏大的时空构架中重新审视和整合人类的文学经验，另一方面将全面研究文本的审美、语言、意识形态、性别、民族乃至娱乐性及商品性等，从而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类文化总是在不断扬弃、不断吸纳中发展的，经过消化和改造的西方文学批评，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意识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注释：

[1] 参见[加]M. D. 维林吉诺娃主编，胡亚敏、张方译：《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 参见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3] 参见王先儒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2006 年第 2 期）

拓展文学批评的视界

——胡亚敏教授访谈录

栗世来*：胡老师您好！我受《甘肃社会科学》编辑部赵国军先生的委托，对您进行一次学术访谈，访谈将主要围绕您的研究展开。首先我要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近年来，您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某些热点问题发表了一些颇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比如，在2007年举行的“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作了“开放的民族主义”的发言，并将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立场。但在如今，民族主义不说声名狼藉，也可谓名声不佳。霍米·巴巴就提出过“不可救药的民族主义”（impossible nationalism）来指称一种狂热的、排外的、极端的甚至是暴力的民族主义，认为它已不再具有“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有机性和进步性。请问您倡导的“开放的民族主义”（open nationalism）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中我们应怎样坚持这一立场？

胡亚敏：“开放的民族主义”是我在思考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西方的关系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我发现，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一体化，反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提升，使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激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向本土回归的趋向，坚持民族的差异性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对全球化浪潮的策略之一。但民族性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体现了一种历史感和凝聚力，可以作为一面反对霸权的旗帜，但也潜在着盲目自大的危险，容易滋长种族歧视与排外情绪。因此，我认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合适的应该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开放”是“民族主义”的定语。在这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中，“民族”被视为关系概念，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之中。同时，“开放的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性中蕴含着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体现为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命形式和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还表现为一种“立足本土，心怀全球”的愿景，即它一方面坚持民族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渴望立于世界之林。“开放

* 栗世来（1976—），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

的民族主义”的要义在于坚持民族的差异性和有容乃大。坚持民族的差异性不是回到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寻找它与现实的连接，将它融入当代社会中去，创造出新的民族特色。与坚持民族的差异性相对，“开放的民族主义”更需要倾听别的民族的声音，吸收其他民族的优长。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几千年延绵不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勇于吸收域外的异质文化，形成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传统。

“开放的民族主义”特别标举这种有容乃大的气度。时至今日，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面对这种情势，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便有了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形态和更为迫切的任务。全球化与文化寻根的交错与冲撞，使我们既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那种单极文化的独霸，又必须深思如何遏制盲目自守、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对话与自我更新的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而在形成面向中西古今的贯通视阈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吸收和改造外来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以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建设的有机成分，如何有效地将中国文学和文化推向世界以使之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以及如何在中外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来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等，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栗世来：我想“开放的民族主义”的提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精神的领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地位。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年学者未曾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您曾在主持一个“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专栏时宣称要“做一个坚定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工作者”。这无疑宣示了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显示了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您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中应该或可以有怎样的“作为”？

胡亚敏：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表现出自身的特色，但如何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仍然是当前文艺理论界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课题，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我想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首先，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在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实现经典语境与当代语境的融合，对其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其次，要注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不仅需要掌握其文论，也需要熟悉其相关理论，并注意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整合；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个专门化的知识和思想领域，而是渗透到各个学科内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综合”时代。最后，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文学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可能完全在理论层面完成，它需要考察当今中国的生存境遇和文学史、文学创作实践，在研究中国问题和文学事